

# 怀念慈母逝世11周年

## ——一位刻苦勤劳苦难辛酸的华裔爱国老妇人（上）



（李冬梅1911 - 2011）

光阴似箭，白驹过隙，弹指之间。不知不觉，2022年4月份又过去了。照习惯，撕开了挂在墙头上四月份的月历，红彤彤字样的五月份月历呈现在眼前。这是红五月呀！仔细再瞧，整面五月份月历有9个数字是红色的，除了5天是星期天月历标红外，其余就是公休日。意思就是说，这个月份有很多假日，其中就有世界劳动人民的节日劳动节、伊斯兰信徒们的大节日开斋节、还有佛教的卫塞节等；可是对我个人来说，5月16日是红字卫塞节外，也是我慈母离开世界的忌日。这个日子，深深埋在我的心坎。

慈爱的母亲离开人世间已经有11个年头了。516是她的忌日，我们兄弟姐妹不会忘记这个悲伤的日子，每年在她忌日到来的时候，我们都会满怀情怀来悼念我们亲爱的妈妈。

我亲爱的妈妈李冬梅是一位普普通通的印尼华裔妇女。她

生于1911年，与世长辞时是

2011年，也就是说，母亲活在世界上足足100年，一个世纪呀！

### 恩爱夫妻

母亲跟父亲结为夫妻是在1931年2月，他们是自由恋爱而结合的。他们相差七岁。村里人都羡慕他们是门当户对、情投意合的恩爱夫妻。在生活长河日子里，母亲亲热的叫父亲是“恒哥”，他们新婚婚后，出门时是手牵手，有说有笑，让邻居们羡慕极了，说他们是恩爱夫妻，一定能白头偕老。他们很少吵架，就是有了小矛盾，母亲总是忍让认输，俗话说，床头打架床尾和，因此，小冲突也就很快平静下来。

1932年6月我便呱呱堕地了来到人间。父母亲把我当成宝贝，我是老大，又是男孩，双亲把我当成小棉袄，爱之心不在话下；我最喜欢的玩具，无论价钱多么贵，他们都很乐意都买给我玩。据亲友们回顾讲述，我在小时候长得很可爱，肥肥胖胖的，一岁多学走路时，摇着屁股，令人发笑，后来逐渐长大，每隔两年我的二弟、三弟相继出世；家庭生活还可以，虽然不很富有，但日子过得很惬意。

### 家中巨变

在我三岁的那一年，我的家突然发生横祸，一场大火，把我祖父、父亲辛苦经营的杂货店焚烧殆尽，我们全家流落成难民，凭着一点积蓄，加上忍痛卖去祖父拥有的树胶园，生活勉强度日。

由于缺乏资金，复业无望，父亲走投无路，无所事事，日夜打麻将、借酒消愁；母亲劝呀、骂呀，无济于事。母亲为了生活，除了拼命节省之外，想方设法寻找活过；她做过月嫂、替人缝衣、做些小吃糕板叫卖，养一些鸡鸭……我们居住的小村庄西加彬路（Nanga pinoh），华人很少，大家都靠自力更生，母亲一人千辛万苦找活路，在艰苦的岁月中，磨练了她坚强的意志。她对孩子们说，“船到桥头自会直，车到山头自有路”天无绝人之路，也不会从天上掉下馅饼，在艰苦中奋斗终生，再苦也要活下去！

### 穷病缠身

下大雨又遇屋漏水。父亲失去生活斗志，整天沉迷在麻将桌上，有时赌到天亮不回家，长期下去自染上疾病，这个村庄，没有医生，也没有医院，父亲咳嗽不止，咳到出血，而一咳嗽不止时，就吃“

虎标头痛粉”，家里的便药就是头痛粉。父亲的病越来越严重，家里经济越来越困难，可把母亲急坏了。

为了医治父亲的痲病，想方设法，向亲友借了钱，父亲去坤甸（PONTIANAK）去治疗，足足三四个月毫无音讯，一去不还，母亲急死了，请求我的走单帮的堂姨丈，要求让只有七八岁的我搭他的机器小货轮到坤甸去探望生病的父亲。到了坤甸，我也吓坏了。原来，父亲不是好好治病，反而整天整夜在和赌友搓麻将，骨瘦如柴，咳嗽毫无起色；经我苦口婆心、死求白赖地恳求，父亲才愿意回家，回到久别穷酸的家。

我13岁那一年，三叔父从坤甸来到我的家乡彬路看望我们，看到我家穷酸烂摊子很是同情，三叔父自己也有七个孩子的家，家境并不很富裕，为了可怜我们的困境，于是向父母建议，让我跟着他到雅加达读书，我们全家都很高兴。1947年我便离开贫穷的家，在雅加达“中华中学”念书。

### 晴天霹雳

只过半年多，1947年年底，晴天霹雳，父亲病逝。母亲死去活来，非常悲哀，不得不挥泪带着嗷嗷待哺六个幼小的弟妹，

咬紧牙根和恶劣环境作斗争。那时，我由三叔父带到雅加达上中学，母亲艰难的日子，我没有分担，很是内疚。

那时妈妈已经36岁，她与父亲结婚只有16个年头，幸福生活是闪电般的短暂，让她忧伤终生。父亲逝世后，母亲悲痛至极，她黝黑的头发也渐渐白化，皱纹爬上了嘴角、眼角、额头。和蔼、充满温柔的一双眼永远微微眯缝着，好像总有灿烂的阳光照耀在她的前方使她睁不开眼。她挑着重担，一步一个脚印，拉扯着6个12岁以下的娃娃艰难地生活；但是，她总是的脸上带着笑容，从不在儿女面前表现苦恼。

### 改变命运

1950年我初中毕业了，踏进高中校门只不过半年。我突然接到巨港一位校友朱寿生一封快信，他有要事要离开巨港处理，要我到巨港代替他接任华校的教职，我犹豫一下，经过思想斗争，我决定前往巨港任教。

18岁时，我就当了老师。在巨港教育界服务了15年，后来转到楠榜“华联中小学”执教三年，1964年返回雅加达在巴中及醒民学校继续执教，直至学校于1966年被封闭，我失业了。